

風雨中的中國教會

(如同雲彩的見證人之一)

蘇穎睿

(一) 楔子

1. 我們一直以來都企圖解答一個問題：在中國教會史中，有四個不同的浪潮和階段，是有關基督教的宣教士來華傳道的。他們有著不同的政治背景，採取不同的策略，但歷史告訴我們，頭三次（即景教、也里可溫教及明清時期的天主教）只是曇花一現，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但十九世紀來華的基督教宣教士卻能成功地把福音紮根在中國土壤上，究竟原因何在？這與他們所採用的策略有沒有關係呢？這正是我們要尋求的一個疑問。
2. 從另一方面看，十九世紀來華的基督教來華傳道的宣教士，卻非一些如前三者這樣「順利」，而是充滿荊棘，主要有幾個原因：
 - ✦ 早期傳教士是隨著東印度公司及英國軍隊進佔中國，他們無論是在和談上，訂立不平等條約，都是站在英國那一邊。事實上，他們是靠武力打開中國之門，以致傳教士可以自由在中國傳道。因此，中國人視他們為「帝國主義入侵者」，充滿了敵意，義和團事件是個最好的例子，到了1920年代，更有反基督教運動。
 - ✦ 早期不少傳教士，目睹中國在政治上沒有民主政制，在宗教上沒有一神教，他們本以為這是另一個像非洲的黑暗大陸，對著擁有數千年文化的中國視為落後國家，看不起中國的文化，這帶來中國極度的反感。
 - ✦ 不少傳教組織，每到一地，致力去購買土地，興建教堂、學校及醫院。「地主」在中國已經不為人所歡迎，更何況是「鬼佬地主」。
3. 凡此種種因素，造成了中國人對外國宣教士的反感，也造成了傳教的阻力。所以，從歷史角度去看，第四次傳教的情況較前三次更惡劣，況且到了1950年，共產黨全面打擊基督教，到了1960年有形的教會所剩無幾，傳教士被驅逐出境，不少都以為140年的傳道工夫白費，但誰會想到自1979年中共政府對基督教教會稍為放寬，中國教會如雨後春筍，忽然蓬勃起來，1947年只有70萬信徒，時至今日已有至少5000-9000萬信徒分佈在中國各地，究竟原因何在？

(二) 內地會的策略

1. 在芸芸諸宣教機構中，內地會(CIM)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宣教機構，1/3的中國教會是直接或間接為CIM所創立的，所以，我的假設是：中國教會之所以能立足於中國，一定是與CIM的宣教策略有關。這正是我們要探索的問題。
2. 然而，我們要研究CIM的宣教策略，我們發現有兩大問題
 - a) CIM是一個非常「不正統」的宣教機構，Hudson Taylor所立訂的幾個特色都是非常不正統的。
 - ✦ 這個謂faith mission，不肯定薪金、不籌款、不借貸、不欠債，純用信心去倚靠神，這是一個好像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 ✦ 深入及分散在中國內地，這無形是把宣教士放置在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中，尤其是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國家中，正因這原因，CIM的宣教士殉道的至多，在義和團事件中，40%是CIM的宣教士。從「人道」的立場看，這似乎又是一個非常不人道的策略。

- ✦ CIM 亦是第一個宣教機構差遣未婚婦女深入中國內地傳福音，這也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
- ✦ CIM 把宣教士的子女集中在 Chefoo 學校，叫子女與父母分離，這又是否一個值得商榷的策略呢？
- ✦ 他們特別強調與中國人認同，穿他們的衣服，吃他們的飯，住他們的屋，與中國人混在一起，而非建立一個 Mission Compound。
- ✦ 他們那種殉道(No Retreat, No Regret, No Reserve)精神，以致他們無論在中日戰爭，或是共產黨解放中國時期，都沒有任何一個 exit plan，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凡此種種，這些策略都叫我們心中起了不少疑問，這種我稱之為「殉道心態的宣教策略」，看來是非理性、不人道的，但另一方面卻又是其中成功的主要因素，因為他們這種「犧牲」感化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信徒，以致在風雨中他們仍存著這種「殉道心態」，這正是中國教會成長的主要原因，但同時這樣的教會也不是沒有問題的，這正是我們要研究的一個課題。

然而，我們卻又遇上了第二個問題，CIM 不像其他有組織的宣教團體，他們沒有一個全盤計劃，也沒有編定好的策略，我們找不著檔案及開會記錄去追尋他們的策略。我們只能從一些宣教士的傳記、書籍、記錄及寄給 China's Millions 的檔案中看到蛛絲馬跡，從而去構成一幅較完整的圖畫，我想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三) 如同雲彩的見證人-義和團的殉道宣教士

1. 在所有差會中，內地會死的人數最多。何解？

首先，內地會的宣教地區，不少是散在中國內地各省，他們雖然在眾差會中佔人數至多，但他們卻是散於各省中，有些甚至在西南、西山、蒙古、西藏偏遠之地，在偏遠的地方，他們所遇的風險就更多，沿海一帶有英國領事在其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特別保障。

此外，他們的策略是要與中國人在一起而不是建立一個 mission compound，他們穿中國服飾，與中國人來往，住在中國人當中，這樣叫他們更處在一個危險的位置上。

在眾多殉道者中，其中不少是婦女，戴德生是第一個人差過單身的女傳教士往中國內地傳福音，所以在 137 位成人殉難者中，77 位是女性，佔一半以上，為什麼？據香港大學前歷史系教授陳劉潔貞指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她們體形通常比中國婦女高大得多，所以很多中國人都懷疑她們是男扮女裝，藉宣教為名去勾引良家婦女。」這種看法，藉各地鄉紳印刷和張貼的支基督教漫畫招貼和傳單中可見，這是一個無知的悲劇。

最後，我們要明白，內地會其中一個信念：為了基督，他們可以犧牲性命，這種「明知山中有虎，還向山中行」是內地會一貫的作風和信念，一方面是因他們這樣的信念帶來他們更大的風險，但同時也帶來他們的成功，他們的見證卻又委實感動了不少人，尤其這些宣教士遭難時，還是持著一種愛主愛中國人的心，就好像艾渥德師母(Mrs. Ernest Atwater)在面臨丈夫及他們四個兒女及自己腹中的胎兒，一家七口即將遭遇大難時，絕筆字書中說「我沒有後悔來中國，唯一遺憾的，我只做了這麼一點點！」而在義和團之亂殉難的衛理森醫生(Dr. Wilson) 及一家，他弟弟 Robert Wilson 在記念 Dr. Wilson 所建的善勝醫院的基石上寫著：「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約翰福音十：10)

2. 以下是一些殉道者的故事：

a) 在直隸省（今之河北省）殉道的有：

- ✦ William Cooper（顧正道）
- ✦ 貝格一家三口(Benjamin Bagnall)，他們四人於1900年7月1日在保定府被殺，而另外 Charles Green（青牧師）的長女 Vera Green（青維拉）隨父母逃亡數月，身患重病，於10月10日在保定府不支病逝。
- ✦ 在浙江省的有：
 - ✦ 湯明心(David Thompson)，師母及(Agues)，三子 Edwin，四子 Sidney 及女傳教士 Josephine Desmond（戴芸詩）等五人，在衢州城內被殺殉道。
 - ✦ 王明道(George Wan)及師母 Etta，兒子 Herbert，和女傳道 Emma A. Theigood（良思善）等四人於7月22日在衢州城外被殺。
 - ✦ Edith Sherwood（石姑娘）和 Etta Manchester 二人則在衢州城於7月24日被殺。
- ✦ 山西省
 - ✦ Emily Whitchurch(魏美例)Edith Searell (蘇梅蘭姑娘)於6月30日在孝義縣跪著禱告時被殺。
 - ✦ Duncan Kay 牧師、師母 Caroline 及第四女兒 Jennie 於9月15日在曲沃被殺。
 - ✦ Stewart McKee 牧師（紀長生）及師母 Kate，幼子；及 Charles S. Anson 牧師，師母 Florence，長女 Dora 次子 Arthur，幼女 Eva；Maria Aspden，Margaret Smith 等十人在大同被殺。時為7月12日。紀牧師的長女 Alice 獨自逃開躲在牛棚內，7月13日被發現而被殺。
 - ✦ 衛理森醫生(W. Millar Wilson)，師母 Christine，幼子 Alexander，及女傳教士 Jane Stevens Mildred Clarke 等5人於7月9日在太原被清官兵斬首殉道。
 - ✦ Margaret Cooper 及其子 Brainerd 逃亡時，心力交瘁而先後死
 - ✦ 白守貞(William Peat)，太太 Helen，長女 Margaretta，幼女 Mary，女宣教士 Edith Dobson，Emma Hurn 等6人於8月30日在隰州被殺殉道。
 - ✦ 宓學成(George McConnell) 師母 Isabella McConnell，又容有光牧師 John Yong，師母 Alice，傳道 Elizabeth Burton，S. Annie King 等7人於7月16日在河津被殺。
 - ✦ 羅定聖牧師(Anton P Lundgren)太太 Elsa 及傳道 Annie Eldred 三人於8月15日在汾州府被殺殉道。
 - ✦ 米姑娘(Haltie Rice)在逃亡中，被拳民打至重傷，於8月11日經湖北省雲夢不幸逝世。
 - ✦ 女傳道 Edith Nathan，May Nathan 及 Eliza Heaysman 三人於8月13日在大寧被殺。
 - ✦ David Barrett 逃亡入山中，因飢寒交迫，在21日在岳陽糧絕殉道。
 - ✦ Flora C Clown 師母經數月逃亡，抵達漢口，生下女兒 Faith Gloun，但不到二個星期夭折死亡，時為8月27日，她產後身體衰弱，於10月25日在上海不治而死。
 - ✦ Alfred Woodroffe 逃亡入山中，於8月18日在岳陽糧絕殉道。
 - ✦ Peter A Ogren 逃亡被打受傷，10月15日抵平陽不治身亡。

- ✦ Rev. Saunders 第四女亦於 7 月 27 日逃亡因糧絕而死。
- ✦ Mary Lutley 於 8 月 3 日亦在鄭州餓死。
- ✦ Rev. Saunders 長女 Jessie 於 8 月 3 日亦於譚家河餓死。
- ✦ Rev. Lutley 的幼女於 8 月 20 日在河南平陽餓死。
- ✦ Nathaniel Carlson, Mina Hedlund, Sven A Persson, Emma Persson, Gustaf Karlberg, Oscar Larson, Anna Johanson, Jennie Lundell, Justina Engvall Ernest Peterson, 於 6 月 29 日朔平府全體被殺。

3. 殉道者及其他內地會宣教士心聲

- a) 丁良才牧師(Rev. Fredrick C. H. Dreyer)是從平陽府集體逃亡到漢口的一位劫後餘生者，途中他親眼見到同工 Rev. & Mrs. Albert A. Lutles 及兩個女兒 Mary (三歲) 和 Edith (一歲半) 捱不住艱苦的逃亡而先後離世，他經歷過這樣一段驚心動魄的大逃亡後，留下一段心聲。

「讓我們不要忘記，義和團事件只不過是一場大風暴，是迂腐守舊官僚的垂死掙扎。近 33 年來，中國內地會差派數百各宣教士，深入遠離通商口岸數百哩外中國內陸各省，卻從未遇到兇暴人群而喪失生命，除了感謝父神的保守外，豈不也顯出中國大都是守法的，安分和平的嗎？」

丁良才繼續在中國傳道直至 1940 年退休回美，一生服事中國人超過 45 年，他代表了全體殉道者的心聲，100 年後，福音在中國終於成長，皆因有他們這些落在地裏死了的麥子，得以結出許多粒子來。

- b) 在山西孝義縣 (太原東南約 75 哩)，內地會在此建立了宣教站，魏美例姑娘(Miss Emily B. Whitchurch)蘇梅蘭姑娘 (Miss Edith Searell) 負責在此傳教，魏姑娘是英國 Wiltshire 人 氏，蘇姑娘是紐西蘭 Christchurch 人士，他們在那兒替村民戒煙，又大大興旺福音，據蘇姑娘家書說「每主日崇拜，都是滿座的；我們要擴大我們的會堂…」當 1900 年事發時，在山西孝義縣 (太原東南約 75 哩)，內地會在此建立了宣教站，魏美例姑娘(Miss Emily B. Whitchurch) 蘇梅蘭姑娘 (Miss Edith Searell) 負責在此傳教，魏姑娘是英國 Wiltshire 人 氏，蘇姑娘是紐西蘭 Christchurch 人士，他們在那兒替村民戒煙，又大大興旺福音」

- c) 兩封遺書，一封是魏姑娘在 6 月 28 日寫給另一位宣教士的信，其中有云：
「…大部份信徒都非常勇敢，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各處的人都警告他們，不久就會有人打死你們的，但他們都說已經隨時預備好了…我們都是不怕死的。」

另外蘇姑娘在 6 月 28 日寫給馮貴珠姑娘有云：

「你信中談到，這地方很有可能比那地方安全一點，但是，親愛的貴珠，從人的角度來看，我想通通都是不安全的，可是，生命若是藏在基督裏，那裏就是安全的，主的兒女有處避難所，那是至高的隱密處。上主是我堅固的保障，無論現在或是永恆，在祂裏面有平安。我們是否只因為減少了一點我們所希望的壽數，就口發怨言呢？「在地上少了一刻時光，在天上便多一刻時光」「生命越是短促，就越早接到永生！」

魏姑娘死時 51 歲，蘇姑娘死時 40 歲。

- d) 在山西省平陽府(今之臨汾市)，1909 年建了一所「衛醫生紀念醫院」(Wilson Memorial Hospital)中文取名為「善勝醫院」是記念在義和團事件殉道的 Dr. William Millar Wilson (衛理森醫生)，是衛醫生家人捐獻的。

衛醫生在 7 月 6 日用德文寫了一封信給丁良才教 (Mr. Dreyer)，遺書中有云：

「四面八方，都如雲霧一片迷茫，但是我想，老朋友，我們已處在火山邊緣，而太原就是火山口，我寧願現在還住在你那裏，我不知說怎樣感謝你，在最後數天誠摯招待，你一直與同工分憂，不斷悉心照顧，在分手時，我也不知道如何表達我的謝意，因為這使我感到在中國過去的兩年，是我活得最快樂的日子！」

他寫完此信，趕去太原，在 6 月 26 日抵達，翌日即發生一場大暴動，他與師母及子女都被殺殉道。

(四) 在荒山野嶺的宣教士

1. 張爾昌 (Gladstone Porteous) 及郭秀峰 (Arthur Nicholls) 都是從澳洲來的內地會宣教士，他們追隨 柏格里 (Samuel Pollard) 來到雲南的深山與苗族人士傳福音，影響極大。張爾昌生於澳洲之 Carngham (Victoria 省 1974 年)，父親 John Dempsey Porteous 從蘇格蘭移民到澳洲。他蒙神呼召加入中國內地會，與郭秀峰等宣教士來到雲南，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創造了 Yi alphabet，他是採用拉丁譯音。他在 Victoria Richmond 的 Rehoboth Missionary College 畢業，1904 年來到中國，1906 年被派到 Sapushan，專負責苗人的福音工作，同時他又學習中文，又因為他有醫學知識，以致他在苗人中作了很多醫治的工作。
2. 1907 年他與郭秀峰醫生 (Dr. Arthur G. Nicholls) 及王懷仁 (George E Metcalf) 他們從昆明騎著驢子，經過三、四天翻山越嶺，終於抵達苗人居住的村莊，因為苗人從沒有見過白人，有金色頭髮、綠色眼睛、大鼻子、高大身軀，引起哄動，苗人一直躲在山區，耕種、打獵，生活非常落後。苗人拜鬼神、靈精，有許多迷信的習俗，他們燒香拜神，又是多神教，每逢婚禮或喪禮，他們打起鑼鼓、跳舞、叫著，希望藉此驅走邪魔，他們又殺豬及羊來獻祭，全村大吃整個星期，因為他們以為若不是這樣作，將會大禍臨頭，所以，一個人死後，通常經過 20 天才入土為安。
3. 當這些傳教士來到苗人村莊那年，發生了瘟疫，幾乎每個家庭都受到影響，圓周十哩內都受感染。因為前陣子有大雨降下，簡陋的房屋倒塌，那些地方人獸共住一室，衛生惡劣，以致發生傷寒疫症，受感染者都死亡，死屍橫陳，不得安葬，情況嚴重。郭秀峰與張爾昌二人，不顧生命危險，明知那兒發生疫症，仍然冒死進入災區，人家離開疫區，他們卻進入疫區。他們到了災區，一方面是醫治有病的，另一方面又安葬亡者，又幫助他們重建家園，又教導他們衛生，不與動物同住，又教導他們喝清潔食水，又幫助他們除去迷信的習俗。不少人因為他們的見證而信了主，他們開始讀聖經，最後並在 Sayingpan (撒營盤鎮) 建立了福音基地。
4. 張爾昌於 1980 年與 Minnie 小姐結婚，Minnie 小姐也是從英國來的傳教士，他們在撒營盤鎮建立了基地後，又繼續向北進發，在 Nosu 族人工作，並且大有成績，在 Salaowu 又建立了另一個福音基址，郭爾昌是一位出色的語言學家，他與郭秀峰把聖經譯成三種少數民族語文，馬可福音有 Laqua language，馬太福音有 Ha language，及整本新約聖經譯作 Nosu 語言。
5. 在眾多的信徒中，其中一位名叫黃志明，他在撒老盤鎮的教會學校受教育，後來在教會當起傳道人，並且主領撒老盤鎮的教會。到了 1949 年共有 5500 個苗人，Yi 及 Lisu 信主，他拒絕參加三自教會，受到打壓和迫害，最後被判死刑，他的死卻激勵了無數的苗人，時為 1973 年 12 月 28 日，英國西敏寺為他豎立一個近代十大殉道者的碑來記念他。

- 張爾昌於 1944 年 11 月 10 日，在 Salaowu 染了傷寒 Tyhus 而死亡，他死時苗人為他立了一個碑紀念他，那時有二萬個 Yi 及苗人信主，但到了今天，信主人數超 40,000 人，在文革時代，他的墓碑被紅衛兵破壞，但後來得以復建。
- 至於郭秀峰，他在 1894 年抵達中國，成為內地會傳教士，但他太太於 1903 年因病逝世，他是黃志明的導師，也是對他生命有極大影響的人，無可否認，郭秀峰和張爾昌的「殉道者心態」，的確激勵了像黃志明等千千萬萬的中國信徒，在 1950 年時代仍堅守信仰，以致中國教會可以在風雨中長大起來！
- 最後，我們要談談 Samuel Pollard(柏格理)。他是英國循道會教會，他也是與郭秀峰、張爾昌等人在雲南少數民族作宣教工作。他在 1886 年離開英國，1888 年來到雲南，直至他在雲南染到 typhoid 死亡。他最大的成就是創立了苗人文字，這稱為 Pollard Script (也稱為 Ahmao Script)，一直沿用至今，他是借用一個循道會宣教士 James Evans 在北美洲紅番區所用的方法來創立苗人的文字，他創立這文字也得到一位中國人 Stephen Lee 極大的幫忙，Pollard 從沒有宣稱這是神特別啟示，以致他可以創出這文字，並譯成聖經，而是因神的恩典，他努力工作而得出的結果，他用這新的文字，把整本新約聖經翻譯過來，但可惜他在 1915 年在雲南因染上傷寒而逝世，死在異鄉，被葬在那兒。1995 年中國政府為他的墳墓修築，並宣稱為 National Monument。

(五) 遠在新疆的宣教士

1. 馬爾昌教士(Mr. Percy Cunningham Mather 1882-1933)

唐詩中「隴西行」是嶺南人陳陶的作品，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這著名的邊塞詩，只提到「隴西」—今日甘肅、寧夏等省，若再向西行，便是偏遠的新疆了，新疆人民多聚居在那沙漠的綠洲，而內地會的馬爾昌教士卻是從老遠的歐洲來到這個不毛之地，為的是把福音傳給那些人聽。

馬爾昌生於 1882 年 12 月 9 日的英國利物浦之北 Fleetwood，從小與海為伍，富有冒險的精神，並擅長小提琴、口琴等樂器。1903 年信主，1908 年加入內地會，到 Glasgow 聖經學院攻讀兩年的神學教育，1910 年 9 月 10 日離開英國，10 月 24 日抵達上海，在安慶接受語言訓練，剛好那時一位從芬蘭來的宣教士同學患了急病，由馬教士護送他到蕪湖醫院動手術，不幸手術失敗，病人沒有醒過來，而他自己因下雨，全身濕透，發覺患了瘧疾(Malaria)，雖然漸漸地康復，但卻沒有根治，以後到了西北新疆省，仍不時發作。

1911 年 5 月被派到寧國府工作，他利用他音樂的恩賜傳福音，還有他在醫學上是出名的博學，他往往可以治療一些病。有一次一個病人來找他，他懷疑是血中毒，他找不到治療方法，就先用很強的消毒劑塗在紅腫的地方，然後用一種膏油敷上，這治療竟然醫好那病人。

同年他又唸過胡進潔牧師(George Hunter)的日記，有感 Hunter 在過去七年一直孤軍作戰，他於是決定追隨 George Hunter 到新疆去，他寫了兩封信，一是給何斯德主任(Dixon Hoste)，一是給 George Hunter，要求接受他為同工，所以 1914 年開始，他們二人並肩作戰，縱橫在西北之新疆，同心興旺福音。

1914 年，他帶著簡單的行裝，拿著小提琴，離開寧國府，先步行 25 哩，再乘船到蕪湖，經蘭州入新疆。5 月 11 日到迪化（即今日的烏魯木齊）。其間有不少的苦與樂，2 月 2 日從西安起行，與三位醫生同行，路上食物和旅店極劣，馬教士寫著：「無論如何，女宣教士能夠忍受得住的話，我一定不能訴苦。」

2月22日，遇到大風雪，其中一名女醫生因沒有雪靴，幾乎失足掉在深谷之中，3月22日經蘭州，4月5日抵肅州之酒泉市，在街頭拉小提琴，並在街頭佈道二小時，派單張等。

經過了一年，他寫信給上海說：「在此城中有許多回教人和東甘人，每十個便有八個是回教徒，對福音非常抗拒，但東甘人較易接觸，甚至邀請他去傳福音給他們聽。」他似乎經過一年時間，已經略略了解新疆的民情、風俗和習慣，並且有機會向他們傳福音，那時新疆人口約200萬人，回教徒佔96%。他於1916年帶領了一位中國軍人信了主，名叫王弟兄，馬教士就訓練他，希望他成為當地教會的領袖，他又成功帶領了一些軍人信主。

從馬教士的來信中，我們也看到當時新疆政府的腐敗，當時的新任總督是楊增新，是一位清末遺臣，為了鞏固其地位，往往攬愚民政策，封鎖文化，防止新思想，新文化輸入，實行閉關自守，不推廣教育，視學校為「致亂的根源」。又停辦俄文法政學堂，省立中學和師範學校，只維持高等及初等小學，他又討好回教徒，令回教首領可以橫行，他公然贊成吸鴉片政權是十分腐敗的。

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大批白俄湧入新疆省，馬教士趁著這機會，一面傳福音，一面作翻譯的工作，他完成了三本巨著。

✦ 英蒙字典(Mongolia-English Dictionary)

✦ 蒙古文教科書(Mongolia Text Book)

✦ 滿洲字典與文法(Mongolia Grammar and Dictionary)

有了這些工具，下一個接棒的宣教士，便比較容易進入中國邊疆工場了。

✦ 1926年9月到1928年9月回國述職，他在英國學習專醫眼科的疾病，因為蒙古患眼疾者高，當時Manchester Royal Eye Hospital破例收他為特別醫學生，並學習一些小手術，不但如此，他又藉著這機會在一間牙科及骨科醫院學習醫術。

新疆分南北二部份，南疆多是維吾爾人(Uyгур)，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畜牧只是小部份，北疆是哈薩克人(Kazah)及蒙古人，以畜牧為生，並與蘇聯有大宗貿易，馬教士多在北疆，從迪化到喀什，要54天時間，再從喀什到伊犁則需時18天，1929年他返回新疆，獨自兒帶著他蒙古僕人Nimgir從迪化出發，去阜和(Fukang)到處傳道與探訪，其後又到三台(San Tai)向回教徒傳道，又派發天路歷程，其後又吉木薩爾(Ji-mu-sa)向甘東人、回人、哈薩克人及蒙古人傳福音，1929年6月27日又再從曲化向西行至天山，在荒山野嶺，經歷許多危險疾病，神卻保守他們。到1930年7月，他獨自兒在新疆西北邊界的塔城(Chug Chah)一面作醫療工作，一面傳道，向不同種族的人傳福音。

到了1932年，有6位新宣教士，包括Dr. Emil Fischbacher, Mr. Raymond Joyce, Mr. George Holmes, Mr. William Drew及Mr. Otto Scharmer及Mr. Aubrey Parsons加入西北作宣教士，一面醫病，一面傳福音，1933年因回軍馬仲英作反，死傷甚多，他們全部加入搶救傷兵的行列，不料因辛勞過度，馬教士及巴醫生(Dr. Fischbacher)先後染到傷寒，於5月24日及27日離世，他們的見證，實在令人感動。

2. 巴富義醫生

我們發覺CIM宣教士中，死於傷寒病的(Typhus Fever)甚多。事實上，在20世紀中，士兵死於傷寒的比陣亡的人士更多，在蘇聯共產革命中，有300萬人死於傷寒，在中國傳教的，特別是醫療界人士，死於傷寒的也不少，其中一位便是巴富義醫生，死時只有30歲。

巴醫生生於 1913 年於蘇格蘭的 Glasgow，雙親都是敬虔的基督徒，生有 8 個子女，巴醫生排行第 6，父親熱心宣教工作，希望 8 位兒女中有 5 位當宣教士，他自己是一位企業家，希望支助 5 個子女當宣教士。

他們的長女 Elizabeth Fischbacher 首先加入內地會，在內地會工作了 13 年，她與楊紹唐牧師在山西省洪洞神學院同工，後來她退休後仍留在中國，成為自由宣教士，主領培靈奮興會，影響倪析聲復興，著名的聖光學校尹任先校長也是蒙她幫助的。他的幼弟 Theodore Fischbacher 是於巴醫生離世後才加入 CIM，在中國娶妻生子，工作了 15 年，到了 1949 年才被迫離開中國。

巴醫生自 12 歲開始便立志作宣教士，他在愛丁堡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畢業，獲 LRCP 及 LRCS 資格，在不同醫院當醫生，後來在 1931 年 5 月，他在 China's Millions 看到一位無名宣教士的一封公開信，引起他注意，他呼籲有 200 位青年人加入宣教行列，他於是回信給 China's Millions 的編輯，就這樣他加入了 CIM 行列，成為 200 位宣教士其中一位。

1932 年他抵達上海，剛發生「一二八事變」，1931 年九一八事變中日軍入侵錦州，100 年東北淪陷，上海民眾情緒極熾，組織救回抗日，但軟弱的上海市長屈服於日本，但到了晚上日本海軍進佔上海，中國 19 路軍張若嵩帶兵力抗，力戰月後，直至 3 月 2 日回軍才被迫撤退，但博得全國讚賞，因著政治局勢影響，語言學習一度受阻，巴醫生眼見回軍傷亡甚多，乃挺身參與醫治工作。最後他抵達安慶的語言學校，與 72 位一同習中文，受訓完畢，他與 Raymond Joyce, George Holmes, William Drew, Otto Scharmer 及 Aubrey Parsons 一起前往西北新疆的迪化（也即今日烏魯木齊）作宣教工作。

當巴醫生在安慶受訓時，他父親來信表示願意在經濟上支持他，但內地會是信心差會，一切從教會及個人奉獻的同存在同一的戶口內，平均分配給全體宣教士，一律平等，貧富共享，巴醫生完全贊同此舉，因而婉拒了父親的好意。

他們一行六人預備從安慶出發往新疆去，但由於當時局勢混亂，往新疆的路線有困難，本來他們想乘坐西伯利亞火車，經過蘇聯境而入新疆，但因俄國革命，未能取得入境簽證。於是他們決定取陸路經蒙古大沙漠而入新疆。巴醫生精於修理汽車，他們便在北京選購了二輛貨車，帶備配件、汽油、物資、藥物、食物、零件等約 1000 磅，橫越大沙漠，路程約 2000 哩的艱辛旅程。

這路程充滿危險，其一，沿途的流沙陷阱多，往往車子陷在困境，其二，車子渡河，實不容易，其三是汽油的補給，因沿途沒有加油站，但按他們在 China's Millions 的報告，神都祝福他們，在旅途中遇到瑞典探險家，科學家 Dr. Homer，並得到他派駱駝隊協助過河，又供給汽油，叫他們可以化險為夷，全程 57 天，其中行車時間只有 22 天，修平、渡河及加油等反耗了 35 天，沿途又得胡進潔牧師 (Rev. George W. Hunter) 作領隊，渡過處處難關。

但最終他們於 1932 年 11 月 5 日抵達迪化，較早期預算遲延了一個月，到達新疆時，已入初冬，氣溫降至華氏 17 度，當時迪化人口約 60,000 人，許多物品都是從俄國進口的，但不幸他們抵達時，發生馬仲英叛軍來進攻，以致物價高漲，真的把這 6 位新來的宣教士嚇壞了，他們到達後，開始與在那兒工作了 23 年的馬爾昌教士同工。

據他們的報告，我們略可知其中的情況「回民的叛變是想推翻省長，省長又因本省的無能，借用了俄國軍人的勢力，這些俄軍大部份都是在蘇聯變色後的白俄軍人流入西北區，而省長金樹仁則利用他們這支約 2000 人的部隊，1933 年，大批俄國軍隊布防，1 月 29 日入宣教行列，他於是回信給日叛變的回民襲擊迪化城，俄軍與回民發生激戰；當回民撤

退時，把整個郊區夷為平地，集體屠殺，洗劫一空，後因省長對俄軍待遇不週，雙方又發生衝突，俄軍與回民停火，並且發動攻擊衙門，活捉省長，但他卻從邊境逃入俄國邊境避難。」

因著戰爭之故，死傷甚多，醫院只得一名馬醫生，和一位年老的俄國醫生，這位馬醫生是受訓於內地會醫生 Dr. George Cox，這場戰爭導致 75000 人喪生，有大批傷兵，有中國人，有俄國人進入醫院，往往超過 300-400 個病人，於是內地會宣教士便加入救亡的行列，巴醫生工作量尤甚，在 4 月 17 日他寫信給他作醫生的妹妹說：「這是一場混亂的戰局，但是主奇妙地保守我們，雖在槍林彈雨中，我們一點也不害怕，只是忙於救人工作，我收集了一大堆子彈作為紀念…，傷兵源源不絕，我為他們動手術，當我見到那些股骨之處裂開的傷兵，實在恐怖，裏面 300 多名傷兵仍未獲救援，不夠儀器和藥物，實在困難…」

在他最後的家書中，他描繪列工作的情況，真是難以想像，「這三個多月讓我走進了中國人最真實的生活中，不然也許要過許多年才有這樣的機會，老實說，我真的無法照顧整個迪化城，若問：「為什麼你又要作呢？」只因看到這些人的需要，我就不能袖手旁觀。」

他身心過度疲勞之際，接觸病人，以致染上傷寒(Typhus Fever)，5 月 11 日時突然心胸絞痛，更是發燒，5 月 26 日病情轉壞，到了 27 日與世長辭，息勞歸主。

巴醫生在 1932 年 2 月 1 日抵達上海，同年 11 月 9 日到達新疆烏魯木齊宣教，1933 年 5 月 27 日因傷寒而逝世，在中國渡過了 1 年 3 個月又 26 日，在新疆工作只有 6 個月 18 天，去世時未滿 30 歲，他死時，城裏每一個人都對他心懷感激，政府大小官員公認他的偉大，在追悼會上寫上「捨己救人」四個大字。

他們的犧牲有何結果呢？在某一個程度上後期中國的靈工團老遠從山東來到迪化傳福音，甚至為主犧牲，坐牢仍是不放棄，或許都是受像巴醫生這些宣教士的感染！

(六) 死於共軍的宣教士

1. 伏格思(Henry S. Ferguson 1869-1932)

「長征」是中共建國的基石，據史家記載，當時有三條「長征」的路線

- ✦ 一是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所領導的一支紅軍。
- ✦ 一是由張國燾所領導的一支紅軍。
- ✦ 一是由賀龍所領導的紅軍。

1932 年 5 月 12 日，當時伏格思牧師在安徽省正陽關，被張國燾所領的紅軍擄去，據推測他可能是在八、九月間遇害殉道，因伏牧師被擄後數日內，一直還有消息，各方面盡力設法營救，但在國民黨政府軍「圍剿」下，紅軍突圍繼續「長征」，伏牧師應該是在長征中遇難的。

- ✦ 伏格思 (Henry S. Ferguson) 於 1869 年生於加拿大的多倫多，其出身與早年事蹟不詳。他於 1895 年初來華宣教，2 月 15 日抵達中國後，隨即被安排到安徽安慶學習中文。10 月中旬語言訓練結束，被分派到安徽太和縣工作。太和宣教站創建於 1892 年，伏格思到那裡時，已有三位宣教士和一位中國信徒在那裡工作。寧德恩 (T. A. P. Clinton) 和宓爾修 (C. Benson Barnett) 來自澳洲；馬春山 (William R. Malcolm) 來自紐西蘭。而那位中國信徒朱明德 (Chu Ming-teh) 原是一位老儒生，是在正陽關 (今正陽鎮)

宣教士博春臣（John Brock）的帶領下信主的。自從太和宣教站成立後，他便成為福音堂的看門人。他們以太和縣為基地，經常出去到方圓百哩之地。

1931年夏天，正陽關再次遭遇巨大水災，從伏牧師7月的信中，可見當時水災之嚴重："這是本市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天災，全城百分之八十浸沒在水中。.....街上汪洋一片，除了較高的地段外，其它商店水都漫過櫃檯。我們的房子位於全市的最高處，並且建築時地基還加高了一呎，因此，水沒有漫到我們的前門.....。我們家住滿了災全部被軍隊徵用。當軍隊出發後，軍部紅十字會又立即入駐，用來治療處理傷兵。同時，反基督教學生也湧入城中，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基督教宣傳。同年七、八月間，曾發生多次軍隊要強行佔領宣教站的行動，但都蒙神奇妙保護，得以安然度過。此後他們也受到散兵、遊寇搶劫之威脅，甚至到糧盡援絕之地步，但均化險為夷，絕處逢生。

兵荒馬亂，天災人禍，加之長期勞累，伏師母於1930年底染病臥床。次年年初稍見好轉，1月24日學校開課，她還主持招收了60位女學生。2月，她再度病倒。伏格思雖然從懷遠醫院請來長老會醫生為其診治，但病情還是加劇，延至4月3日，伏師母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58歲。伏牧師暮年再度喪偶，倍感傷痛與孤獨。

- 果然如伏格思所料，水災過後，又是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國際水災救濟總署（The Inter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向中國內地會借用伏格思，負責正陽關的賑災工作。此時伏牧師年事已高，而且在中國宣教已經36年，本該退休返國了。但當他看到饑民遍野，又臨危受命，遂毅然接受使命，全力投入到賑災工作中去。他聯絡所有商店代作銀莊，並且租用糧倉，散發救濟金，分派糧食給災民。

1932年5月11日，傳言紅軍將要入城，各商店因此不敢代勞，紛紛把救濟金交還伏牧師。這時，崔牧師（Pastor Tsui）和眾信徒也都勸他趕快逃走。但是，伏格思堅持留下來繼續賑災工作，並準備第二天分發救濟金給災民。崔牧師見此，也留下來陪他。次日清晨，約有張國燾所部1,000多紅軍入城，伏、崔兩位同時被捕。當時在場有二百多平民百姓，全體跪在紅軍軍官面前，懇求釋放伏牧師，因為近幾個月來，他是全城唯一關心和救濟他們的人，使他們不至餓死。軍官雖然耐心地傾聽眾人的哀求，但還是扣押了他們。15日晨，紅軍帶著伏、崔兩位牧師一同撤退。於是，大批民眾再次攔路要求釋放伏牧師，但軍官堅持不允，只是答允善待他們。

5月17日，與伏牧師同工的宣教士慕悟仁（Wilson W. Moore）電告上海總部說："證實紅軍把伏牧師從正陽關押解往霍邱或六安，請代禱。"

5月29日，上海有消息稱伏格思已被押往河南省的商城。途中他頗受優待，有騾馬代步；並且一日兩餐，與紅軍首領同待遇。然而，每到一地，紅軍卻讓伏格思站在高臺上示眾，而伏牧師則趁機向群眾傳福音。

伏格思被捕後，福音站一位胡弟兄火速跑到壽州，將消息報告給美國北長老會的仲姑娘（Miss Mabel S. Jones），再由她轉達給上海內地會總部。紅軍撤離後不久，崔牧師在押解途中脫險歸來。而關於伏格思的下落，卻不斷有消息傳來：

另據壽縣仲姑娘來信說，一位名叫洗秉元（Sen Bing-yueh）的弟兄，是伏牧師的摯友。因掛慮伏牧師的安危，於5月底，獨自到紅軍部隊駐防地尋找伏牧師，卻被誤認為奸細，遭紅軍扣押。洗弟兄反而向紅軍作見證，述說伏牧師如何領他歸主，如何使他不再沉迷於醉酒和賭博。最後紅軍沒有允許洗弟兄見伏牧師，卻把他釋放了。

7月12日，內地會的《億萬華民》主編報導，經過中國政府、英國領事、國際水災救濟總署署長詹信爵士（Sir John H. Simpson）、內地會和當地人民的極力營救，迄今仍無結

果。紅軍扣押伏牧師的目的似乎不是為了贖金，而是以他作為對付政府軍圍剿的擋箭牌。7月28日，上海內地會秘書報導稱，共產黨向政府提議，用伏牧師和另一位被囚的信義會宣教士李寶德（Bert N. Nelson），與當時正在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審訊的國際共產黨嫌犯牛蘭夫婦（Mr. & Mrs. Noulens）來作政治性交換。9月1日，再報導稱，漢口內地會曾接到伏牧師的一封信，言及如有可能的話，要求寄給他一些指定的物品。一些認識伏牧師的中國人也稱，在河南的光山見過他。

無論如何，國際水災救濟總署盡了最大的努力，四處尋訪伏格思的下落。詹信爵士更是親自奔走於外交部，以及中國各軍政部門之間。1933年1月31日，他寫信給伏格思的子女說：

"雖然現在我們還無法確切地證實伏牧師的生死下落，但在兩個月前，當我返回中國的時候，接到一份比較可靠的報告，言及紅軍在政府軍猛烈攻擊下，遂殺害了伏牧師。.....因為沒法證實此事，到底他是否仍在川陝交界的紅軍手中？當我到了湖北和河南時，或許可以獲得進一步消息.....。我很遺憾沒有機會與令尊見面.....。

但是在安徽省最嚴重的災區裡，有一位如令尊這樣可靠而又能幹、全心全力投入的人來主持賑災事宜，是我最放心的事。我深信、也是大家所深信的，他若不是為了照顧總署的財物，他早可以逃出了。.....這一切總署深感歉疚，並要對令尊負全部的責任。如果不幸伏牧師因公殉職的話，我會請求總署為他舉行一個最為深切的追悼會。.....我曾徵求內地會總幹事的意見，想伏牧師也會認為是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去救濟最嚴重的災區.....。

伏格思牧師就這樣靜悄悄地走了，在世享63歲。

3. 師達能

師達能於1907年1月18日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帕德遜鎮（Paterson, New Jersey），父母親來自荷蘭，父親彼得（Peter Stam）起先從事建築業，繼而發展房地產、保險業和木材生意而致富。夫妻二人皆為敬虔的基督徒，共養育六男三女，師達能排行第七。

師達能自幼就讀於教會學校，少年時即已清楚救贖真義。但他的性格非常內向，怯於向陌生人傳福音。父親曾為此特別訓練他，鼓勵他獨自出去宣道。師達能15歲時便出外謀生，曾試圖在商業上有所發展。但四年後，他對商業興趣全無，反倒有志於成為一個宣教士，因此他進入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深造。在校期間，他先後選修了宣教課程和聖經課程，各門功課，包括實習，他都十分優異。同時，他亦熱心投身於學生志願海外宣教運動，參加內地會裴忠謙牧師（Rev. Isaac Page）每周在其家中舉辦的祈禱會。從中他越來越認識到世界上有千百萬失喪的靈魂需要拯救，以致他對海外宣教，特別是對中國宣教的負擔愈來愈重。他在自己的見證中說：*神把中國放在我的心里，並且愈來愈重。我實在找不出任何一個理由來對主說，我不能去中國，因為中國的需要是這麼大！從神的話語和禱告中，加上研究中國的情況，以及我自己的際遇，使我毫無疑問地知道，主是真真實實的引領著我*（黃錫培著，《捨命的愛》，第416頁）。

在裴忠謙牧師的祈禱會上，師達能認識了女同學史文明（Miss Betty Scott）。他們常常在一起禱告，記念中國人靈魂的需要，共同的志向使他們成為好朋友。1931年春，史文明畢業，遂加入內地會。同年秋，啟程赴中國宣教。臨行前，她與師達能一起來參加最後一次禱告會。會後，他們把兩人相愛的消息告訴裴忠謙牧師，並決定把他們的婚事繼續仰望在主的手中，深信祂必會成全。

1933年10月25日，師達能和史文明在山東濟南結婚。新婚蜜月後，二人於11月下旬同返舒城。此後，這對年輕的夫婦便積極投入各項教會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種聚會；街頭佈道；售賣福音書或派發福音單張等，而史文明則更多地負責婦女和兒童工作。他們也時常跟隨宋長老外出探訪信徒或佈道。工作雖然辛苦，但為主做工，服事純樸、可愛的中國人，他們心中充滿喜樂。

1934年2月，師、史二人從舒城南下，到旌德宣教站訪問。該站負責人任明光夫婦（Mr. & Mrs. Samuel Warren）正準備於是年夏天返國述職，故希望他們前來主持這裡的工作。師達能夫婦用了24天的時間，行程二百多哩，巡迴探訪了附近各福音站。在一個星期六的早上，他們和羅傳道（Evangelist Lo）一起，到距旌德12哩遠的廟首探訪教會。廟首教會的信徒大多住在農村，需要牧養，因此他們邀請羅傳道來做他們的牧師。到廟首後，師氏夫婦住在王太太（Mrs. Wang）的家，她是廟首的第一位信徒，是數年前內地會唐進賢牧師（Rev. George W. Gibb）夫婦巡迴佈道經過這裡時，所結的果子。翌日，他們和信徒一起進行主日崇拜。在廟首的時間雖短，但彼此相處得非常融洽，留下美好的印象。

1934年9月，史文明的產期臨近，他們就留在舒城待產。稍後，乘火車到蕪湖。9月11日，他們的女兒愛連（Helen Priscilla Stam）在蕪湖醫院誕生。當史文明尚在蕪湖調養之時，師達能即隨顧芳德教士（Erwin A. Kohfield）一起到旌德進行實地考察。因為旌德一帶常有紅軍出沒，並曾一度佔領旌德。當時，師達能一家將要被分派到旌德工作，為安全起見，他們先到旌德實地考察，以作定奪。當他們見到旌德縣長並征詢他意見時，他表示歡迎，並承諾若遇危險時，他可以派兵保護他們。

1934年11月下旬，師達能夫婦抱著初生嬰兒小愛連遷到旌德縣。史文明忙著布置新家，照顧愛連。師達能開始計劃宣教站事工，探訪信徒，還特別約羅傳道於12月7日來廟首相會，商討羅傳道搬家來廟首等事宜。稍事安頓後，師達能又特地去拜會了彭縣長（Mr. Peng），縣長再次向他保證他一家人的安全。

未料，12月6日早晨，史文明起床後，正在給愛連洗澡。忽然槍聲四起，未幾，紅軍已湧入城內。有信徒來報，紅軍已將城包圍，如今正在逐戶搜查，街上一片混亂。史文明迅速用厚衣服將嬰兒包裹，並把兩張五元鈔票用別針別於衣內，還為嬰兒備了些食品，以防不測；師牧師則帶領家人與僕人一同跪下禱告仰望主。頃刻間紅軍士兵進門，師達能夫婦以禮相待，並且把一切財物都給他們，但紅軍還是要把他倆和嬰兒一起帶走。當僕人欲跟隨同去時，紅軍以槍阻止。

在紅軍的總部，師達能被命令寫信到上海內地會總部，全文如下：

"致上海內地會親愛的弟兄們：

今天在旌德縣，我的妻子、嬰兒和我已落在共產黨的手上，他們要求二萬元贖金來贖我們。他們已拿去了我們一切所有的，但感謝神，我們心中有平安，並為今晚有一頓飯而感謝讚美主。求神給你們智慧，懂得如何處理，也賜給我們勇氣和平安。祂無所不能，尤其在這一時刻，祂是奇妙的恩友。

今早事情發生得太快，傳了許久的謠言，終於演變成令人擔心的事實。不過兩三個小時紅軍便佔領全城。根本沒有時間準備，一切已太遲了。

求神賜福及指引你們，至於我們，無論是生、是死，都願神得榮耀。

主內師達能手書

1934年12月6日安徽旌德"（同上，第421-422頁）

12月7日晨，紅軍押著大批俘虜和物資，向廟首進軍。師達能懷抱著愛連，史文明尚有馬可騎。到廟首後，他們被單獨囚禁在郵政局裡。局長與師牧師曾有一面之緣，見狀拿些水果給他們吃。師達能則趁機寫下數行短柬，請其代寄。三日後，局長見到羅傳道，遂把信轉交給他。

是日夜晚，紅軍將他們解往一處深宅，闖入一間房內，讓母女倆睡在床上，卻把師達能綁在床腳，整夜站著，房門外有哨兵看守，如此捱過一夜。次日上午，一隊士兵湧入，粗暴地將夫婦倆推出門外。他們被押往村外的一座小山丘，沿途街道兩旁但見人山人海，群眾的冷嘲熱諷、怒吼謾罵聲不絕於耳。但師達能夫婦內心平靜安穩，迎著朝陽，如同跟隨著主耶穌的腳蹤，一步一步地走上鷹山（Eagle Hill），最後雙雙引頸就戮，凱旋榮歸天家。當時，師達能牧師年僅27歲；史文明28歲。

當師達能夫婦被押往刑場行刑時，他們那剛剛出生兩個多月的女兒愛連被丟在床上，無人照料有36個小時之久，但在神的奇妙護佑下，竟被人發現並拯救出來。

原來師牧師到達旌德縣之後不久，即與羅傳道（Evangelist C. K. Lo）約好，於12月7日在廟首相會，一起出去傳福音。12月6日（星期四）晚上，羅傳道偕家抵達廟首，住在信徒王太太（Mrs. Wang）家，卻不知當日在旌德所發生的事。次日，紅軍突然襲占廟首，羅傳道也遭逮捕。虧得當地張秀軒先生（Mr. Chang Hsiu-sheng）認識他，證明他是好人，紅軍才釋放了他。於是他全家連夜出逃，星期六整日藏匿於附近山上。

星期日下午，紅軍撤離後，羅傳道一家回到廟首，才聽說師牧師夫婦於前日上午遇害的消息，隨即打聽嬰兒的下落。但人們多怕事躲閃，不敢多言。幾經周折，羅傳道才找到關押師牧師一家的大房子。但見屋內外一片凌亂，進屋後，忽聞嬰兒微弱的哭聲，循聲找去，終發現躺在木床上的小愛連。只見她裹在一件連帽的羊毛西式嬰兒套裝，內藏幾塊尿布，和兩張用別針別在外套里面的五元鈔票。旁邊木桌上還有一些剩余的奶粉、白糖和餅乾。羅傳道急忙抱起嬰兒，直奔王太太家，把嬰兒交給自己的太太照顧，然後同王太太和她兒子，急奔鎮外鷹山師達能夫婦殉道處，尋得他們的屍體。王太太和她兒子找來兩副木棺，又和羅傳道一起用白布把屍體包裹起來，放入木棺裡。當時有許多村民在現場圍觀，當把木棺蓋好後，羅傳道做了禱告，接著就對民眾說：

"你們見到現今這個情景，對我們的朋友遇害會感到可惜。但你們當知道，他們是神的兒女，他們的靈魂已安息在天父懷中。他們是為著你們，才來到中國，才來到廟首，要把神的大愛、主耶穌的救恩告訴你們，使你們信耶穌得永生。你們已經聽了所傳的福音，眼見他們的犧牲，那就是真憑實據了。不要忘記他們所講的，要悔改，信福音!"（同上，第434頁）

簡單料理完後事，羅傳道立即偕全家帶著愛連北上。他們用擔竿挑著裝有兩個嬰兒的籬筐----一頭是小愛連，一頭是羅傳道兩歲大的兒子----趕路，經涇縣到宣城，沿途找年輕健康的乳母給愛連喂奶，同時，羅師母也用史文明留下的十元錢給愛連買奶粉吃。12月14日到達宣城後，當地的白安基教士（George A. Birch）立刻陪同他們一起乘火車到蕪湖。最後把小愛連和廟首郵政局長轉交的師達能遺信一併交給內地會安徽監督韓粹中牧師（Rev. William J. Hanna）。遺書內容讀來感人至深：

"致上海內地會親愛的弟兄們：

昨天一些共產黨人經過旌德時把我們擄到這裡來。我曾經要求他們讓我的妻子和女兒帶一封信從旌德到你們那裡去，他們不肯。所以我們今天一起來到廟首，途中有段路他們容許我的妻子以馬代步。

他們要求二萬元贖金才可以釋放我們，我們直截了當的告訴他們，不會有人付這筆錢的。因此他們便把救災的款項、我們身上的錢，和一切的財物，全都拿去了。

願神在你們所做的一切事上賜給你們智慧，並用祂的恩典來扶持我們，能以不屈不撓的勇氣站穩。祂是全能的神！

主內師達能手書

1934年12月7日寫於廟首" (同上，第435頁)

從遺書內容，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師達能牧師對神的忠貞與信靠，以及面臨危險和死亡時的鎮定與從容。韓粹中牧師強忍悲痛，急忙找來美以美會醫療宣教士包讓醫生 (Dr. Robert E. Brown)，仔細為小愛連檢查身體，當證實一切正常後，眾人才如釋重負，皆稱她為"神蹟嬰兒" (Miracle Baby)。隨後，韓牧師委托護士吳寶和姑娘 (Miss Laura M. Woosley) 照顧並護送她到山東濟南市，親手交給她外祖父母史蓋臣夫婦 (Dr. & Mrs. Charles E. Scott D.D.) 撫養。

史蓋臣夫婦當時在濟南宣教，他們先是從上海內地會發來的電報中獲悉女兒及女婿被紅軍擄走的消息，立即寫信給師達能在美國的雙親說：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他們仍活在世上，請切切為他們的釋放代禱。.....達能和文明愛主耶穌基督，他們懷著愛人靈魂、領人歸主的心，容光煥發的利用每一個機會傳福音，他們滿有屬天的盼望。因此，無論他們是忍受酷刑，或是遭遇任何傷害，都絕不會否認主的，他們是基督耶穌的精兵" (同上，第443頁)。

其後不久，當他們聽到女兒和女婿已經為主殉道的消息後，史蓋臣仍充滿信心地說道："他們絕不是徒然死了，殉道者的血仍然是教會的種子。由於他們對主的委身，我彷彿聽到了我們可愛的孩子正在父神面前讚美主，因為祂看他們是配為主基督的名受害" (同上，第443頁)。

師達能的父親也回電回給內地會總部，表達他對孩子們的弔慰：

"似乎是很大的犧牲，但還比不上神將祂獨生愛子賜給我們的恩典來得大。我們堅信羅馬書8章28節：'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誰可比得上這樣的榮耀呢？我們心愛的孩子，達能和文明已經去了主那裡。他們愛祂、事奉祂，如今更靠近祂了！" (同上，第443-444頁)

慘劇發生後，中外人士皆為震驚。安徽省省長親自下令，重殮殉道者，以軍車裝載他們的靈柩，由官兵直接護送到蕪湖。1935年1月2日，在蕪湖為師達能夫婦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和安葬禮。中外人士，包括中國政府、美國領事館和其他領事館等官方代表，以及中外基督教機構的代表擠滿了蕪湖醫院的禮堂。追悼會後，他們被安葬在蕪湖的外國人墓園。這樣，師達能牧師和師史文明師母，成為中國內地會第73和74位獻身於中國的殉道士。

在師達能夫婦合葬的墓碑上，中間鐫刻著一個十字架。在十字架之下刻寫著："1934年12月8日在安徽省之廟首"；十字架左邊旁刻著："師達能 (JOHN CORNELIUS STAM)，1907年1月18日。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腓立比書一章二十節)"；十字架右邊刻著"師史文明 (ELISABETH SCOTT STAM)，他的妻子，1906年2月22日。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腓立比書一章二十一節)。墓碑的基石上還刻寫著："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啟示錄二章十節)。

聖經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翰福音 12 章 24 節)。當師達能夫婦遇害的消息公佈後，來自中外的唁電唁信如雪片般地飛到上海內地會總部，僅抄錄幾段如下：

"倘若死亡比活著更能有效的事奉神，我們也願意照著去行"。

"我們誠懇地禱告，但願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為了靈魂得救和神的榮耀。倘若能令更多靈魂歸主的話，或是為了激勵更多可愛的青年基督徒，畢生委身事奉主。那麼，我們是何等甘心地去經歷這場痛苦的體驗！"

"我們的兒女在失喪的靈魂中為主工作，這是何等的光榮！當中的兩個孩子，還奪得了殉道者的冠冕，這是何等的榮上加榮呢！"（同上，第 444 頁）。

師達能夫婦的殉難，震撼了整個歐美世界，除吊唁信件和宣教奉獻金如潮湧至外，還有不少人捐錢捐物給小愛連，甚至有不少基督徒家庭願意認養她。更為令人驚訝的是，志願獻身前往中國的宣教士不減反增。慕迪聖經學院有 700 位同學，威爾遜學院有二百多位同學，皆立志奉獻給主，至死忠心不移。

一位英國青年基督徒讀過戴存義師母所著《慷慨成仁----師達能夫婦傳》一書後寫道："我相信任何人讀完這本書，都無法不受感動，因這真像使徒行傳的另一章！.....在宣教士的名譽榜上，也許沒有比得上這對夫婦的。他們如此的獻身，僅僅過了非常短暫的婚姻生活，便蒙召付上了最高的代價！我深信，這書在各處發出的馨香，是復活的主從天上所賜的福氣"（同上，第 444 頁）。

一位寄自山東青島的來信，表達了一個中國人的哀痛、歉疚和敬意："對於這種毫無人性的冷血謀殺，我們全中國皆為此慘劇而難過。這兩位為了把福音傳給我們中國人，卻慘遭毒手，是我們中國人欠你們家人最大的債。對師先生夫婦甘心樂意、勇敢地獻上了生命，我們深深地向他們致衷心崇高的敬意"（同上，第 445 頁）。

在潁州，凡與師達能夫婦熟識的人，無不為他們的被害感到悲傷難過。特別是舒城宣教站的信徒們，當聽到他們殉道的消息後，全部跪下，為自己不冷不熱的事奉而悔改，並願意效法他們的榜樣，舍棄自己，廣傳福音。

據悉，2002 年時，師達能夫婦的女兒愛連仍然健在，只是出於種種原因，她不愿接受任何訪談，因此人們對她的生平所知甚少。但我們確實知道，有許多關心她的人一直都在為她禱告。從教會歷史專家陳一萍女士所寫的"給愛連"一文中，我們從中能夠感覺到一些甚麼。無論如何，陳女士的話代表了許多中國基督徒的一點心聲：

"然而，我也知道妳是多麼願意埋名隱姓，不為人知。直到如今，妳謝絕一切訪談，拒絕看到一切關乎妳父母的文章。.....但在這一切之上，要特別請妳原諒我們中國人，欠了妳永生永世還不了的血債、孤單成長的債（有誰知道妳內心世界，正如廟首那夜，妳臥在襪襪中，無人知曉妳如何度過），甚至我們欠了妳福音的債，如果妳因此而軟弱跌倒.....。請接受我們誠摯的道歉，也請妳相信妳父母的血沒有白流，中國血腥的硬土上，確實開出了靈魂的花朵....."（同上，第 447-448 頁）。

但愿愛連如今（2009 年）仍活著，我們繼續在禱告中記念她。